

# 民国中期武汉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动因

## ——主要基于汉口的文献调查

罗翠芳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 结合目前武汉市档案与原始文献, 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中期武汉城市人口, 尤其是汉口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动因进行了大量档案文献考察。结果表明: 此一时期汉口人口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城市本身对农民吸引力、汉口周边发生的战乱以及天灾造成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所致。与此同时, 在城市工商业并不发达状况之下, 大量人口的涌入, 带来或加剧了汉口城市社会问题。

**关键词:** 人口增长; 城市吸引力; 战乱; 天灾; 汉口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4-0070-06

### Main reasons of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of Hankou city in the 1920s and 1930s:

#### Based on the documents survey

LUO Cui-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 The documents survey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in Hankou city had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reason leading migrants into Hankou was greatly lay in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city itself, or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or natural disas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rge influx of population to the city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urban sickness since the urban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Hankou was underdeveloped.

**Key words:** population increase; urban attractiveness; chaos caused by war; natural disaster; Hankou city

民国中期武汉人口急剧增长。以汉口为例, 1928 年 12 月汉口人口为 572 672 人, 1931 年 4 月为 762 366 人, 1935 年 1 月为 816 541 人(根据《新汉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928 年 12 月至 1931 年 4 月间, 汉口人口增加了近 19 万人, 1935 年 1 月比之 1928 年 12 月, 汉口人口增加了 24 万多人。

这一时期汉口城市人口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机械增长(城市内部人口出生数增多), 还是外来人口的增加呢? 笔者通过对同一时期汉口人口的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较, 迁出数与迁入数之比较发现, 这一时期不论是前期汉口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 还是后期出生人数大于死亡人数, 其差值都比较

小, 对同一时期汉口人口的总量影响不大。因而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汉口人口猛增的原因主要是外来人口的涌入。

目前, 有一些文献对近代汉口人口增长的因素有过一些简单的归纳, 如农村的天灾或人祸等, 但其论述仅仅到此为止, 至于这些因素之于汉口城市人口, 是否真的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说其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尚缺乏具体深入的考察, 尤其是缺乏数据上的量化考察与关联度上的实证研究。另外,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城市尤其是沿江沿海的通商大埠因长期发展对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农民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如果说, 目前学界还是注意到了天灾人祸对民国时期农民进城的推力因素, 但对当时城市吸引力即“城市拉力”这个因素相对比较忽视。

有鉴于此, 本文将在挖掘大量档案与原始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计量学方法, 对民国武汉, 尤其是汉口城市人口增长的主因进行系统地追踪性考察,

收稿日期: 2012 - 07 - 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z2011-21-6);  
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089)

作者简介: 罗翠芳(1973—), 女, 湖北松滋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外城市化史研究。

以弄清其来龙去脉,展示更多的历史本相。如此,可以直观地了解当时汉口城市人口增长的原因及过程,同时也将对同一时期汉口其他专题研究有所裨益。

### 一、城市拉力

在现代城市化研究中,有“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之理论。“城市拉力”,通俗说就是城市吸引力。城市吸引力是什么?主要是指城市收入较高、安全、生活方便等。“农村推力”,简单说就是农村的收入低,因天灾人祸而导致的生活环境差等因素导致农村人口外流。其实不妨把这个理论应用到近现代中国农民进城的原因分析之中。在政局长期动荡的近现代中国,汉口这个通商大埠相对于日益衰败的农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首先,城市收入一般高于农村收入。1929年汉口特别市各业工人工资平均收入统计表显示,男工平均月收入为17.30元,女工为9.60元,童工为4.60元(汉口市政府秘书处.汉口特别市市政统计年刊民国十八年度[R]:146),汉口月平均工资是11.06元(卫南.民国十八年度之汉口劳工界[J].钱业月报,第十卷第一号:5-6)。时人说,1934年“汉市一般工人收得之工资,平均每月不过15元以下”。<sup>[1]</sup>然而,1932年6月23日《汉口中西报》一篇文章《逃难者》中说,一家三口在城市里工作“人可以食”;1933年2月13日《汉口中西报》中《拉一天车只得四五角钱》中说,“幸米贱,尚可维持。”的确,“都市上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最低限度,每天都有三四角的收入。”而“农民终岁勤劳,仍然是一文莫名,手头异常拮据。”(左泽生.农民离村问题[J].湖北农村合作社(第二号):19)尽管城市里收入不是很高,但尚可维持生存,其状况比起同一时期大多数农民那种靠借贷度日要好得多,城市年平均工资收入明显高于乡村。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湖北省境内农村工资史料,无法把湖北省内农村工资与城市工资进行对比,但据20世纪30年代对江苏上海、武进、无锡等地域城乡工资的调查,城市工人的工资比农村一般农民平均多50%~500%。<sup>[2]</sup>就全国而言,工农收入差别更大一些。据调查,1933年,全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178元,而农村劳动者的

平均年收入只有26元,前者为后者的6.8倍。<sup>[3]</sup>在比较利益之下,有一些农民,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民,遂“抛去锄犁,群往都市谋生”。<sup>[4]</sup>如在湖北孝感(汉口郊区)，“乡民因农村生活艰苦,羡慕都市繁荣,离村外出者,亦日渐加多,所去之处,以汉口为多。”<sup>[5]</sup>

其次,农民对城市生活预期比较高。一般说来,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认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所作出的,因此,尽管民国中期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现象,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谋食”或谋生。20—30年代中国大城市里实际情况是:“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农民破产的速度比较起来,落后得好几百倍。”<sup>[6]</sup>换句话说,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比不上劳动力的增加速度,城市没有能力容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况且当时汉口经济本身就不景气,城市的容纳能力就更为有限。一方面,在劳动力如此过多而又极其低廉的因素下,车夫、码头工人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另一方面,城市中无业人口、失业人口,或贫穷人口更是显现出加速的势头。《汉口中西报》1933年1月份汉市冬赈调查显示:贫民人数为30多万,“较之前年确增加一倍以上。”汉口贫民人数的增多主要是因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的农民数量增多而引起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更多时候正是因农民对城市美好“预期”的驱动使然。城市尽管出现了不景气,但比之于日益凋敝的农村,城市周边农民还是更愿意选择前者,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谋食或谋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城市的吸引力。

再次,城乡生活强烈对比,凸显城市生活繁华,乡村生活枯燥。时人在谈到湖北农民离村时说:“农民衣食住行都是不合理化,精神的苦闷,使他感到乡间太单调了,太简陋,至于其他卫生娱乐……调剂生活的设备,更是谈不上,因此农民常感到乡村索然。”而城市则充满“物质的诱惑,到处都使人心悦神怡,常有许多农民,因事到商场去的时候,走到街上,东瞻西望,驻足街头好像使他留恋不舍

的样子。这都是表现出农民被快乐所融合了,因此,农民来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区别,更增加了农民厌恶乡村的情绪。”(左泽生. 农民离村问题[J]. 湖北农村合作社(第二号): 19.)实际上,在城乡生活强烈对比之下,民国时期就有不少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青年农民渴望进城过上城市生活。汉口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主编的期刊《社会》,1929年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乡下青年》一文可证实以上的说法,该篇文章有如下强烈的感叹:“‘到都市里去’,‘到都市里去’,这句话差不多成为生活在乡村中的青年们的口号,他们在强烈地呼唤着,他们在焦心地思念着,他们在努力地实行着,所以,都市人口的膨胀,失业的激增,生活的高涨,盗匪的充斥,同时乡村人口的寥落,田园的荒芜,教育的落后,统统是这句口号所造成的病态……”<sup>[7]</sup>尽管以上感叹可能会有一些夸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民国城市对当时农民的吸引力。20—30年代《汉口中西报》中有这样一则新闻:《丈夫要回乡,妻子要留汉》,夫妻二人各走极端,闹入警局,丈夫以生活耗费过高,要携妻子回乡居住,妻慕汉地繁荣,不肯回乡(1934年7月7日《汉口市民日报》)。从以上史料看出,城市生活对农民的吸引力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凸显出来,这一点是研究当时中国农民离村原因时需加重视的一个方面。

最后,城市本身的吸引力还体现在城市中生命与财产相对有保障。相较于日益崩溃、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的农村来说,近代大城市中有大量驻军,或有相对完备的警察制度,还有日益完善的救济制度或保障制度,如不时开设的粥棚、贫民大工厂、妇孺救济院、职业介绍所、每年的冬赈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相对较好的生存或生活环境,使城市显得更为安全,更容易谋食或谋生。这些都是城市吸引力的种种体现。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民国时期农村向城市移动的人流中,除了贫穷的农民外,还有携带大量家财的地主或富农。因为,“汉口近郊之外,抢劫、绑架没有哪一天间断过。令人遗憾的是到这十年的情况进一步的恶化。”<sup>[8]</sup>因此,那些有家财的地主或富农进入城市,其生命财产相较农村更加有保障。

由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工业化才刚刚启动,

其吸收劳动力能力非常有限,民国中期大量人口涌入汉口,不可避免地带来或加剧了城市社会问题。那一时期的汉口失业或不就业的人员遍地皆是,“就最近市党部与社会局各种调查的结果而言,汉口失业人数已在二十万以上”。<sup>[9]</sup>娼赌毒异常兴盛,俨然成为城市中重要的产业,“汉市为鸦片鬼之巢穴”。<sup>[10]</sup>又如,“乞丐何其多也”(1934年9月9日《汉口市民日报》)。“天寒日暮,时届三冬……贫者无衣无食,呼号饥寒。”<sup>[11]</sup>而且还有递增之势,1933年1月汉市冬赈委员会调查汉口市共有贫民三十万人,较之前年确增加一倍以上。“当知中国贫民,并非是由于无谋生之力而来,实由于无谋生之路而成的。”<sup>[10]</sup>再如,汉口每年死亡者,从年龄上看多为壮丁,从病因看,多为传染病。<sup>[12]</sup>再如,汉市自杀流行,从职业类别来看,自杀者中无业者占多数,自杀原因多为贫穷,经济压迫,或生计困难;从年龄来看多为壮年。如此等等情形,在同一时期汉口城市社会中屡见不鲜,值得深思。

## 二、周边战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村极其动荡不安。除了革命根据地发展得如火如荼之外,还有多如牛毛的盗匪横行乡里,这些动荡都造成了城乡人口的单向迁移。穆和德在《江汉关十年报告》中说,近十年里(注:1922—1931)大约有277000人流入汉口,而前十年(注:1912—1921)的移民只有104000人。<sup>[8]</sup>的确,强盗对农村骚扰而造成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强盗之多,横行地域之广,无法一一进行考察与分析,在此,仅对战乱,尤其是在此期间湖北省境内蒋介石军队与根据地红军之间重大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争对其人口的影响进行考察。

本文仅考察距离汉口较近的战事,因为离汉口头途遥远且难走的话,即使是发生重大战事,因交通不便以及故土的难离,战区或难区内也不会有较多的人口逃往汉口。从地理位置来看,鄂豫皖、湘鄂西是湖北省境内较大的两个根据地,且离汉口皆比较近,而这两个根据地又是那一时期蒋介石军队重点“围剿”的地方,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战事对

汉口人口应该会有一些的影响。事实是否如此呢？

30 年代前期蒋介石在汉口附近的“围剿”有：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在武汉行营集结 8 个师近 10 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其中夏斗寅的第十三师(驻武汉东南郊县)进攻黄陂(汉口近郊)，1931 年 3 月初，结束了第一次“围剿”；1931 年 3 月中旬，蒋介石调集 20 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继续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三次“围剿”；1932 年 7 月 8 日，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 50 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众所周知，战火所到之处，农村化为废墟，战区农民大批逃亡，造成难民无数。如在第四次围剿前后《汉口中西报》关于这种拉锯战而造成的乡民逃难的报道层出不穷：

社论《促各县士绅回籍》：鄂省中区剿匪军事……在其乡里一经化为匪区后，即冒险以逃到武汉，宁为苦力乞丐，以勉度晨夕……(参见 1932 年 9 月 11 日《汉口中西报》)

《难民无良民证 不能归家》：黄安、孝感、黄陂、天门、潜江、京山、沔阳等县匪区国军进剿后，难民纷纷逃避武汉，流集于汉口铁路外，汉阳赫山、码头、武汉下新河一带，年少壮丁……(参见 1932 年 9 月 25 日的《汉口中西报》)

《收遣散游以重冬防》：剿匪总部前已进来散兵游民，充斥街市，形同乞丐，不惟有碍观瞻，且转瞬冬防，于社会治安，尤大有关系黄陂，孝感，汉川，天门，京山，潜江，沔阳各县匪区……自我军进剿后，民众相率逃避来汉，亟应限期遣送原籍。”(载 1932 年 11 月 1 日《汉口中西报》)

从以上史料看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战事与汉口人口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战端一开，武汉三镇自然就成为郊县大多数难民的目的地，城市人口自然就会增加。

汉口人口激增的情况，在第一二次围剿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第一二次围剿分别发生于 1930 年 10 月和 1931 年 3 月，在此笔者用 1930 年 1 月至 1931 年 4 月逐月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进行分析(表 1)。

表 1 1930 年 1 月至 1931 年 4 月间汉口逐月人口

月份	人数
1930 年 1 月	620 531
2 月	621 794
3 月	627 911
4 月	635 224
5 月	641 318
6 月	550 169
7 月	656 618
8 月	656 571
9 月	661 017
10 月	708 106
11 月	719 798
12 月	731 570
1931 年 1 月	736 529
2 月	738 169
3 月	747 691
4 月	762 366

资料来源：根据《新汉口市政公报》(后改成《新汉口》)、《汉口市概况》等档案与原始资料合成

表 1 显示，1930 年 1 月至 10 月人口增长相对比较平稳。1930 年的 11 月比起 10 月，一个月之内人口猛增 1.1 万多人，12 月又比 11 月增加了约 1.2 人，1931 年 4 月又比 3 月增加了近 1.5 万人(1930 年 6 月汉阳 4 个警署的人口划归湖北省管辖，同年 10 月汉口从郊区新加入 3 个警署的人口，此一时期的人口增减不作分析)。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4 月间，每月人口呈递增之势，在半年时间内，人口增加了 5 万多。尤其是 11 月，12 月，1931 年 4 月，其增加都超过万人，和这两次围剿之前的人口增加数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此，当时民国政府汉口秘书处主编《新汉口》所做的分析是：都市人口增加之数量，虽视其工商业发达与否为标准，但“都市生活的安全”不能不算一都市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汉口市虽未有工商业发达之可言，而人口恰巧还每月整万的增加，甚至尽管新房屋建筑起来，还闹着住荒。一观本月份人口统计报告，人口还是继续增加。1930 年 11 月份人口为 719 798 人，10 月份人口为 708 106 人，增加了一万一千六百零二人。此一万多人的增加之由来，并不在出生人数之增加，而是在于迁入人数较徙出人数较多 1 万余人所致。<sup>[13]</sup>的确，汉口人口迅猛增加的这个时间点，与蒋介石在 1930 年 10 月发

动的第一次围剿时间点一致。

另外,就1928—1936年逐年人口来看,战乱对汉口人口增加的影响也不难看出(表2)。

表2 1928—1936年间汉口逐年人口

年代	人数
1928	572,672
1929	617,371
1930	731,570
1931	782,765
1932	755,517
1933	770,179
1934	809,215
1935	781,514
1936	760,437

资料来源:根据《新汉口市政公报》(后改成《新汉口》)、《汉口市政概况》、《汉口市公安局业务纪要》、《民国二十三年度市政调查》等档案与原始资料合成

从年份上来看,1930年是1928—1936年间汉口人口增加最快的一年。1930年较之1929年,汉口人口从617 371人陡增至731 570人,一年内增加了10多万。当然,虽不能把1930这一年人口猛增原因完全归结为战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战争在同一时期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作用特别明显。

### 三、水旱天灾

30年代湖北省境内出现了几次大的天灾,1931年大水,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旱灾。天灾与汉口人口增长之间,是否有着紧密联系呢?因天灾而逃离家园的人,在1932年《汉口中西报》报道中屡见不鲜:

6月20日《老丐陈尸路侧——一宵风雨催送残生》:鄂中各县遭水灾后,人民田宅荡然,无家可归,壮者尚有谋生可能,老者血气既衰,无走险之勇,又无负重之力,乞食难图一饱,抱病既无药医治,大都奄奄一息,待哺嗷嗷。昨日有一老者卧于通业里口,骨瘦如柴声嘶力竭,入夜风吹雨打,生命遂告终结,陈尸半日,无人过问,亦云惨矣。

6月24日《欲不得归,一死了之》:武昌拐角楼某号寓有黄安人程某,少有文名,家中小康,频年匪共纵横,农村不得安居,遂束装来省访友,不料该友早经他适,漂流异乡,举目无亲,鹏搏有志,

推荐无人,一住数月,囊空如洗,欲卖车归去,则有恐匪见愁,进退两难,遂萌短见。

又如《汉市小贩之艰难》:盖小贩本小利薄,全家赖以为生……吾鄂自受二十年来水灾后,四乡灾民都集中武汉。但又无谋生技俩,于是经营小贩,藉以糊口。因此小贩日增互起竞争,廉价倾销,获利自微。此其艰难二也。<sup>[14]</sup>

一般说来,天灾人祸使农村生存困难,农民逃亡城市,因而城市人口会增加。但是,具体说来,并不是湖北省内所有的天灾人祸,都会造成同一时间内汉口人口的增加。湖北省境内天灾人祸是否造成武汉三镇人口的增加,还需看天灾人祸所发生的区域与武汉之间的远近关系。因为,如果是远离武汉的村县,即使发生了天灾人祸,或由于交通不便,或人民贫穷,或不愿远离故土等一些具体原因,外出逃难农民,可能更多地会选择附近的城市,而要长途跋涉到武汉的乡民不会很多。下面的调查,可以证实这一点。参见表3:

表3 1931年大水湖北灾区人口之流离调查

省名	每千人中流离者人数	举家流离者所占之百分率	流离人口(个人与举家合计)占总人口之百分率	流亡地点所占之百分率		
				本县	外县	未详
湖北	69	44	48	68	23	9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

表3显示:人口流离于本县的居多,而外县的较少。由此可以推论:即使是天灾人祸造成武汉三镇人口的增加,那些外来人口中,大部分也是来自于武汉三镇周边或邻近的郊县,下面史料证实了这一点。1932年由汉口水灾委员会提供名单,市公安局负责遣送的1 296人中:沔阳795人,汉川197人,黄安90人,汉阳42人,黄冈25人,天门73人,潜江15人,监利9人,麻城14人,罗田8人,黄陂10人,云梦4人,枣阳3人,鄂城3人,通山7人,南漳1人……(参见《遣送留汉难民》,载《汉口中西报》1932年11月6日)又如《逃荒妇失伴:被人诱骗开房间》:少妇罗王氏,孝感人23岁,因乡间遭旱灾,禾苗枯尽,颗粒无收,及随同其父及乡邻多人逃荒来汉……(参见1934年9月8日《汉口市日报》)以上名单进一步证实,并不是所有受灾地方的农民,都会逃亡汉口,换句话说,逃亡汉

口者多为离汉口较近的灾民。再如，在汉口市孤儿院中，“院生人数 334 名，籍贯汉川，沔阳占十之七八。”（《汉口孤儿院参观记》，载 1932 年 11 月 7 日《汉口中西报》）

目前有关 1931 年下半年汉口人口，还没有详细的统计表，所以无法知道 1931 年下半年逐月人口统计，只知道 1931 年 4 月汉口人口是 762 366 人，1932 年 2 月人口是 793 461 人（注：选择来年年初的时间来比较人口的增减，这是因为人口发展有一个滞后性，以下类似），两者相较增加了 3 万多人，随后汉口人口出现了下滑。1934 年夏季湖北省发生了水旱灾，是年 7 月汉口人口是 772 834 人，全年汉口人口的迁入数多出迁出数 33 845 人（汉口市政府造报：《民国二十三年度市政调查》，LSA2. 21-8，湖北省档案馆，市政调查表式 第十号，近五年来户口统计），到 1935 年 1 月时汉口人口总数为 816 541 人，是民国中期汉口人口发展的顶点。由是观之，天灾对汉口人口的影响也比较直接。

当然，推动外来人口进入汉口的原因有多种，不过，城市吸引力、天灾、人祸等是其主要动因，而且这些因素之于汉口人口的影响，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起着作用。当时汉市政府报告与报刊杂志经常如是说：“本市每逢冬季，因各地荒年之故，各方贫民，就食于本市者甚多，去岁冬季，各乡因既受荒年之影响，复因匪共之滋扰，避居本市者，较前数为尤多。”<sup>[15]</sup>又如，“查民国二十年时，因洪水为灾，重以匪祸，各属灾民逃入武汉者甚多。”（《警部飭属：灾民入境毋任逗留》，载 1934 年 8 月 18 日《汉口市民日报》）

#### 参考文献：

- [1]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104．
- [2]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 [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92．
- [3] 巫宝山．中国国民所得：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7：73-74．
- [4]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881．
- [5] 彭南生．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J]．史学月刊，1999(6)：88．
- [6] 刘明透，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579．
- [7] 鹤林．乡下青年[J]．社会，1929(4)：91．
- [8] 穆和德．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185，184．
- [9] 唐性天．中国社会问题之研究[J]．社会，1929(1)：3．
- [10] 陈敏书．七百一十一户烟馆的汉市[J]．社会，1929(3)：48，91．
- [11] 汉口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筹办冬赈[J]．社会，1929(5)：87．
- [12] 汉口市政府秘书处．武汉市民死亡统计与救济方法[R]．汉市市政公报，1929(3)：10．
- [13] 汉口市政府秘书处．汉市十一月份之户口统计报告[J]．新汉口，1930(6)：121．
- [14] 陈绍博．汉口市工厂劳工概况[J]．汉口商业月刊，1935(11)：113．
- [15] 汉口市政府秘书处．汉市之建设与今后之施政方针报告书[R]．新汉口市政公报，1930(2)：61．

责任编辑：曾凡盛